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中国经济是个复杂有机的大系统,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从战略全局推动供给与需求互促发展

□ 魏际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在处理经济发展各种关系时做到“五个必须”——其中第二条提到“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两大内生动力源。没有需求,供给就无法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处理好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关系,处理好上中下游的关系,处理好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关系,处理好大循环、中循环、微循环的关系。因此,必须统筹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快推进需求侧改革,在推进需求侧改革时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

中国经济是个复杂有机的大系统,它的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经济的质量、功能、效率与竞争力的高低,而供给与需求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是这个系统运行的基础。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在14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有力支撑下,市场潜力极其巨大,同时,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枢纽地位难以替代,迈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也为中国经济开辟了广阔前景。

但也要看到,短期内中国经济承受需求不足、供给冲击、预期偏弱等压力,长期看,中国经济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性问题制约。为此,需要统筹近期与长远,将问题导向与战略谋划相结合,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供给与需求新的动态平衡。

立足大国国情,面向长远发展,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推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满足国内各类市场主体需求,全面释放需求活力与潜力。牢牢把握需求变化趋势,推动需求与消费升级、形成供需良性互动,是一项复杂性、系统性、战略性工程,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主动选择,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也是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优势的内在要求。

需求侧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辅相成,统一于国家发展战略,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国梦想,统一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担当。

### 发挥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战略牵引作用

当前,扩大内需存在一些难点,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回答——

如何充分释放14亿人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如何增强国民的消费信心,使大众有稳定的消费预期,敢于消费?如何优化需求结构,引导扭曲的消费行为转向健康合理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如何进一步发展农村、中低线城市消费市场?如何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如何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如何推动生产变革来实现更大价值创造?如何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如何加快形成高效产销对接供需匹配机制?如何形成以质量为导向、以诚信为基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大市场?如何进一步提高市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破解上述难题,涉及适度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构建完整内需体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就业促进与社会分配制度、加快现代化生产和流通体系建设、扩大对外开放、形成供需对接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政策法规以及战略战术、实施路径等内容。

要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调整经济体系、结构、布局以及产品品种、数量、品质、价格等,使其满足不同层次、维度的需求,使经济体系与各类需求相吻合,与经济结构与需求结构相匹配,经济发展与国内外需求条件相适应。针对日益细分的市场,提供更加精细的产品、服务,更加系统全面的解决方案,以更多价值创造来适应、引导、释放需求。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全面促进各方消费,增加有效投资,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内生需求,挖掘新需求,鼓励绿色消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居民

生活,构筑社会安全网以增强消费信心,有序释放潜在需求。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一万美元,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坚持“质量为先”,将质量突破作为满足需求的关键予以重点推进,提高质量水平。要强化标准引领,形成“底线标准、消费者满意标准、战略性标准、国家安全标准、未来标准”相统一的标准体系。形成以质量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构建质量与价格的科学联动、反应机制。推动企业精心设计、精益生产、精细服务。健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高全面质量管理水平。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制度、诚信体系建设。

### 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来实现高质量供给

长期看,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关键要以高质量供给来满足与创造需求。中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需求。当前,国内需求结构正发生重大变化,供给结构需要相应调整。通过消除无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提升供给的质量、水平与层次,可以强有力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创造就业、提高收入,从而增强需求能力和意愿。因此,要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其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建设现代化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以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引领,加快以种业为重点的农业科技创新,推进重大农业科技突破。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生态循环农业和农业工厂等农业新业态。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全环节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建设现代化工业。全方位推进制造业质量变革和产业链提升,全面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扩大中高端产品供给。推动基础研究、基础产品、基础技术、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等自主化发展,统筹关键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专用材料开发、先进工艺开发应用、公共试验平台建设、批量生产、示范推广等领域的建设与

发展。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打造现代制造体系。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超前部署未来产业。瞄准全球新兴产业的制高点,推进新一代信息网络、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海洋装备、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国际化、协同化发展。超前布局重大科技项目,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实施“人工智能+”战略。超前部署量子科技、未来智能、未来制造、未来网络、未来显示、未来能源等未来产业。

建设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体系化、精细化、标准化、平台化、融合化发展。优化生活性服务业。推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规范化、品质化发展。提升公共服务业普惠化水平,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支持中小服务企业发展。重视农村服务业发展。

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构建系统完备、结构合理、安全可靠、便捷高效、智能绿色、互联互通、普惠民生、国际竞争力强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现代、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推进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骨干输排水通道建设。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强化信息基础设施和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形成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构建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发展。统筹发展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绿色制造、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供应链等,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工业、交通、建筑等节能降碳,发展节能环保等绿色低碳产业,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积极推行清洁生产改造,提升绿色低碳技术、产品、服务供给能力。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补短板链、优势链延、传统升链、新兴建链。推动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推动上下游企业联动发展、协同发力。构建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相关企业配套的供应链体系。优化生产力布局。支持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一体推动基础研究、重点研发、成果转化、技术创新、平台载体、人才保障、金融支撑实现有效贯通,构建有利于传统产业升级、新兴支柱产业集群发展、产业竞争力提升、市场主体合作共赢、供需良性互动的现代化产业发展生态。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部分对“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作出部署,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更有效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系统性,更有效地向世界宣介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给世界带来的发展机遇,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提出具体要求。

场域理论是布迪厄整体理论的核心概念,单个行为体在社会化互动过程中,其权力始终受到所处场域的制约与影响。国际传播中存在着为争夺话语权展开斗争的领域。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出发,通过惯习重塑和场域建构等,能够更加深入地洞察国际传播中的权力关系和动态博弈,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供理论支持。

惯习与场域既相互约束,也相互建构。场域通过其规则和结构形塑了惯习,而惯习又通过行为体的实践赋予场域意义并推动其动态变化。在多元化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国际传播场域中各国的质疑和冲突持续存在,形成了泾渭分明的舆论场划界。各种观念、立场正面交锋,它们在话语范式、议题设置、公共语境中或认同、或对立,都有可能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产生威胁,亟须重塑惯习以破解其中的难题。

打破西方范式,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当前国际体系中存在的单边主义霸权话语是影响国际话语权发展和演变的主要因素。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前提是要打破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占据国际主导地位的“元话语”“元叙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阐释、提炼话语资源,注重从大历史逻辑、文明发展逻辑、大国责任逻辑出发对叙事体系进行系统构建与创新。

强化议题设置,扩大国际话语影响。议题设置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话语影响力的核心因素,中国要通过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提出具有全球意义的新议题,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的话语体系,实现对西方设置的虚假议题的消解。只有破除“后来者”只能被动接受现状,不断扩大我国的话语影响力,才能不断破解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缩小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弥补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

重构公共语境,改变国际话语转向。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向全球推广其发展模式和思想价值体系,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公共语境。通过简单复制、机械搬运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以实现自身繁荣与强盛的做法并不可取,这是由各国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存在的差异所决定的。任何话语意义的产生都依赖于特定语境,重构公共语境是塑造话语惯习的关键,而其他国家在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时也会迎合公共语境。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能够持续影响其他国家乃至国际传播场域的话语观念。

国际传播场域不仅是一个静态的结构,更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各国为了获得优势地位和占有稀缺资源,在场域中展开竞争与博弈,既包括对资本与资源的争夺,也包括对制定场域规则和掌控话语主导权的争夺。因此,场域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所塑造。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制度理念已经深植于现有的场域规则,中国在中国文化态度、传播方式、网络治理方面提出的“中国方案”致力于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秩序。

尊重文化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当前“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死灰复燃,沉渣泛起,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虽然植根于各国土壤的文明之间存在差异,但并非“唯我独尊”,而是多样共存。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才能不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只有秉持平等与尊重、摒弃傲慢与偏见,深化对自身文明与“他者”文明差异性的理解,才能有效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促进形成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局面,进而建构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国际传播场域。

形成复调传播格局,加强国际舆论引导。在国际舞台上,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持续影响,中国的“他者化”身份定位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长期遭到众多谎言叙事的“污名化”和“妖魔化”。中国要坚持“有礼”“有据”“有节”的原则,采用复调传播方式,打出国际传播“组合拳”。通过运用形象生动、易于感知、引起共鸣的语言表达方式,更有效地吸引受众,用“金句”“亮点”潜移默化地传达中国官方立场,同时借助媒体、学者、智库以及民间力量共同发声,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传播格局,以此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

推动互联网治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互联网作为当今社会主要的舆论宣传场域,是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面向,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也改变了国际传播场域的规则和权力结构。一方面,互联网传播正在改变甚至解构传统的传播媒介;另一方面,已形成的场域规则也在拉扯与抗衡互联网“现实空间”背后的权力机制。当前,全球互联网资源分配不均、网络空间“巴尔干化”、数字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严峻。按照怎样的方式将互联互通的世界组织起来,这是当下世界面临的治理难题,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深化全球数字合作、构建普惠繁荣的网络空间、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共同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中国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经济大国”,但尚未成为“话语权大国”,要不断将物质实力转化为话语资本,用中国叙事打破既有话语惯习,以平等互惠变革场域规则来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从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传播影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

(作者单位:山东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弥补短板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

主动议题设置  
实现国际话语权突围

□ 童建安 李萌萌

# 古籍走进新时代

## “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发布有感

□ 王志民

经之原典却是多出齐鲁之人,因而汉代齐学、鲁学之分,实为经学主流学派之别。被梁启超称为“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的诸子百家时代,齐鲁为文化“重心”所在:百家之学,多出孔子之教,诸子主流学派多出齐鲁之人;儒、墨号称“显学”,稷下学宫更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中心,被郭沫若称为:“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划时代的意义的”,“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的。”虽然两千年来,历代政权的兴替、播迁,文化中心时有转移,但山东作为孔孟的故乡,重文兴学之风不泯,名人接踵,大师辈出,著书立说,蔚成传统。此即山东不仅为文化高地,也是古籍大省及中心之缘。

前人的辉煌贡献,即后人光荣的历史责任。山东历来高度重视古籍工作,特别是在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文件下发后,山东省迅速响应——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随即出台落实措施。省委宣传部牵头抓总,将山东古籍工作列为山东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制定出台了《2025-2035年山东省古籍工作规划》,明确了2025-2027年古籍整理出版重点方向项目清单。这一系列规划立足山东实际,将古籍工作分解为可操作、可量化的具体任务,形成了层次分明、稳步推进的工作格局,形成有条不紊地推进山东古籍工作的山东方案。

### 下大气力,出大成果,呈现“山东气象”

山东古籍工作有着深厚的人才基础和优良传统。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指示部署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共计24部正史,山东大学就承担完成了其中5种的整理工作,居全国各大高校首位。此后山东大学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老子正诂》《墨经校诂》和王仲荦先生《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西昆酬

唱集注》,萧涤非先生主编《杜甫全集校注》,黄云眉先生《明史考证》等老一代学者为代表的成果都是古籍校注、考证、深度整理的典籍名著,成为学界公认的经典之作。1988年,由山东出版总社负责编辑的110册《孔子文化大全》面世,成为国内第一套儒家文献集成丛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年来,山东省从深入贯彻国家古籍工作战略部署的角度,狠抓古籍工作“山东方案”的规划落实,省委宣传部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依托山东大学、山东出版集团等高校和科研、出版单位,充分发挥省、市与有关方面积极性,在搞好顶层设计、科学规划的同时,狠抓“山东方案”的落实,出现了精品力作迭出,重大成果不断涌现,各地古籍整理成果纷呈的局面。

例如:近些年先后出版的《山东文献集成》共收稿本、钞本、刻本等地方文献1375种,是首部山东地方文献的集成之作;《儒典》则从传世儒学文献中遴选230函、1816册、4789卷经典著作的最优版本,分“经解典”“义理典”“志传典”三部分出版,集中体现儒学形成和发展的主脉路,是一部系统丰富、蔚为壮观的精华之典;《齐书》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齐文化经典文献进行全面系统整理出版的一项开创性重大文化工程,共精选收录传世经典文献200余种,成书规模约2000余卷,4000余万字,计1096册。《子海》则广收子部之书,达5000余种,收书之多,远超前代,并精选要籍500种进行了校点整理和研究;《孟子文献集成》收录文献700种,海内外孟学精要典籍尽收其中。2022年,山东启动的《齐鲁文库》的编纂,拟用十年时间,分九编,旨在打造齐鲁文献最丰富、最完备的集大成之作,现正在稳步实施推进中。这些大型古籍文献丛书的出版,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不仅彰显出古籍工作的丰硕成果和“山东气象”,也为“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的推出奠定了坚实基础。